

注重对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调查研究

白南风；王小强；杨晓

据一九八四年以来持续进行的十四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心理反应调查看，我国确实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各阶层及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格局发生的变化，已经导致各利益集团在对改革的态度和要求上出现日益明显的差异

社会主义要取得人民与社会利益的最大一致，但这并不等于说由于职业、身份、收入财产、文化水平以至居住区域的不同，人们不具有相互区别的利益的，不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论述正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同利益集团的认识基础上作出的。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使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多元化的变动趋势，使利益集团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突出起来。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当社会经过争取温饱的初级发展阶段之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需求结构变化诱发的产业结构重组，农村的城镇化变迁，满足温饱后人们对文化艺术以及民主生活的要求，都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同时导致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以及观念的多元化，在不同利益集团此起彼伏和重新组合的同时形成整个社会的剧烈变动，甚至酿成政治的动荡。这时可以说，能够把握和驾驭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就能够掌握历史的主动权。

不同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不容忽视

改革向纵深推进，意味着经济利益更剧烈的重新分配和整个社会组织结构更深刻的变动，也要涉及不同人群现有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重新组合

根据我们一九八四年以来持续进行的十四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心理反应调查看，由于职业等方面的差异，我国确实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各阶层及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

格局发生的变化，已经导致各利益集团在对改革的态度和要求上出现日益明显的差异。城市改革初期，价格改革引起的物价上涨，对城市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基本上是均匀的；发生的社会心理反应，方向比较一致，问题比较集中，宣传与政策选择（如普遍加钱的补偿生措施）也比较容易。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正面指向原有体制的核心——企业组织制度之后，尤其是在包括机构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决策日程之后，改革向纵深的持续推进，都将意味着经济利益更剧烈的重新分配和整个社会组织结构更深刻的变动，同时也当然要更直接地社会范围地涉及不同人群现有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重新组合。

自一九八五年四季度，人们对改革的要求和对现状的态度已明显出现多元化倾向，从改革初期对物价上涨的集中关注迅速扩大到收入不均、人员流动、社会保障、干部制度、以权谋私等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对二十个城市二千五百五十五人的调查中，我们列出了十三项群众有可能提出要求的现象，结果不仅项项都有不少人选择，而且人们对改革的要求和对现状的态度也产生了显著的差别。譬如，对于“收入不平等”，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工人最为不满；对于“挣钱机会太少”，不满程度最高的是大学生、研究生，其次是工人；对于“有些人对收入要求太高”，不满最甚的是单位负责人；而对于“以权谋私”和“任人唯亲”，单位负责人的不满程度却又低于其他职业，等等。通过相关分析计算证明，不同的心理反应是与人们不同的利益和社会地位以及改革措施引起的变化紧密相联。调查结果提醒我们，单项政策或改革措施得到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一致拥护是不可能的事情。改革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将使一部分人失去以往的利益，使另一部分人得到利益；或者使一部分人在一个方向上失去一些利益而同时在另一个方向上得到一些利益；或者使一部分人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降低社会地位；或者使一部分人在失去经济利益的同时得到社会地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准确地把握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不同要求，已日益成为改革决策不容忽视的问题。

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态度不同：人们对改革的期望越高，对现行改革的评价就越低。根据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改革要求，有针对性地设计改革方向，能使改革的社会成本大大降低

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态度不同，与他们对改革的期望不同有关。每个人对改革及其成果的评价，与他希望改成什么样或者希望通过改革得到什么有密切联系。根据我们一九八六年十月对三十八个城市二千四百四十五人的调查，人们对改革的期望越高，希望通过改革得到的越多，对现行改革的评价就越低。

在一九八六年另一次调查中，大学生和研究生对改革速度的要求最高（认为改革速度太慢），而他们对改革成果的评价在十个职业分组里仅为第七位，是很低的。单位负责人对现行改革的评价相当积极，占第二位，而他们对改革速度的要求则较低，为倒数第二位。大学生、研究生的改革意识“超前”，很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在大变革时期，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变革时期，对现实不满是改革的动力。青年知识分子经常比一般群众具有更高的改革热情，可能成为改革借重的社会力量；但是这种热情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脱离现实的倾向，又有可能打乱改革决策的战略部署，影响安定团结，发生一定干扰和破坏作用。如何正确引导和使用各类社会群体的不同积极性，成为改革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功地将武士阶层转变为新兴资本家，英国的不少贵族在大革命后向资产阶级靠拢甚至进入其行列；匈牙利、南斯拉夫在改革过程中高度重视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调查研究，同时积极开展各个阶层就各种问题对话，这些历史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根据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改革要求，有针对性地设计改革方向，能使改革的社会成本大大降低。譬如：我国目前在农民、工人、干部这三大身份之间，流动的可能性很小。一个人想改变身份，除上大学和农村招工之外，几乎不可能。这就形成了各种身份在对于改革的态度和要求上的差别。调查结果表明，影响干部群体（包括单位负责人、

企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一般干部、中小学教师、其他各类专业人员、大学生和研究生等)对现行改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期望,这种期望越强,对改革的评价越低;而在非干部群体(包括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户、无固定职业者、中学生等)中,却是希望通过改革获得更多选择工作、晋升、挣钱和公平竞争机会的期望影响最大,得到更高经济收入的期望影响其次,这两类期望越高,对改革的评价越低。这说明个人对于改革的期望,干部群体比较看重社会地位的提高,非干部群体则比较重视收入的提高,并希望通过选择工作和挣钱机会的增加来实现。如果我们的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分别满足这两种社会群体的不同需要,便可使改革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根据不同利益集团在改革期望中的不同侧重点,可以利用补偿原理调整和提高他们的期望方向和满足程度。例如,非干部群体收入期望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变身份不可能,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收入提高上。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劳动力流动的增加,可以增加这部分人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弱化他们对增加收入的强烈要求。同样,干部群体对提高社会地位的关注,也有可能通过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增加得到替代和补偿。这种利益的相互补偿,不仅能在利益格局变动的情况下争取最广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还能为改革构造社会经济运行的新的主体力量。

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不同

不同的社会群体,改革的承受能力不同。在改革设计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的承受能力,区别对待,这是一项重要并且长期的任务

当前,由长期低生活水平及近年来对外开放的冲击而形成的高度改革热情,与因长期大锅饭体制而形成的低风险承受能力,共同构成我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心理结构:高动力与低能力并存。

不同的社会群体,改革的承受能力不同,在历次调查中,大锅饭体制内部人群的风险承受能力都低于大锅饭体制外的人群(如农民、个体

户等)。一九八五年二月对 十一个城市十六个县二千四百零九人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八类职业中，农民选择风险大但增加收入机会多这一生活方式的比例最高，达百分之十六；而工人只有百分之十，居第五位，商业服务业人员只有百分之七，居第六位。从所有制看，个体户中选择风险大生活方式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二，远高于集体（百分之十）和全民（百分之十二）；而选择平稳生活方式的只有百分之六十七，远低于集体（百分之七十九）和全民（百分之七十八）。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越强，对改革的态度越积极。在上述调查中，对价格改革担忧与不满情绪最强的，恰恰是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分别为第一位和第二位。

因此，在改革设计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承受能力，区别对待。对于大锅饭体制中的职业群体，应注意提高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进取性，稳定并提高他们对改革的评价和支持，这是一项重要并且长期的任务。

几点建议

目前我国对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状况缺少系统调查研究。为此，建议加紧建立全国性的调查网络，为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提供社会心理和社会阶层状况的调查分析

第一，理论、宣传上明确不同利益集团存在的客观现实，在调查研究的科学基础上使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全社会范围一定程度地明朗化。目前，所有人对改革都有拥护的一面，同时对未解决的问题又有不满的一面。如物价上涨，城市居民最关心的是副食品，农民头痛的却是生产资料，城市居民中也主要是少数特大城市居民反应最强烈；如民主自由，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主要从政治角度来关注，而另一些职业群体如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等，则更关心职业流动和选择的自由。不同利益集团不同要求的明朗化，使人们既能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减少盲目的不满情绪，也能明了其他社会群体的要求，增加群众对政府决策的谅解和支持。

第二，针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选择合适的形式和渠道，就各

种人关注的不同问题展开决策执行部门与不同人群的正面对话，改变以往过于一般的宣传方式，深入到不同人群中去分别解决不同的思想问题。

第三，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应成为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据我们调查，非干部群体提高收入的焦点已从一般性的长工资发展到要求更多的就业选择性、要求更平等就业机会上来，因而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当相应地给予更多的考虑。同理，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也应同时考虑干部群体的机会增加问题，吸引一部分人为获得更高收入或满足其他需求而去从事其他职业，等等。

第四，加强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调查研究。目前，我国对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状况缺少系统调查研究。由于缺乏正式的全国性的社会调查网络和队伍，此类研究难以以标准化形式定期持续进行，同时抽样和调查的可靠性、准确性亦受到影响。从技术上说，根据已有的调查实践，建立全国性调查网并使调查标准化、程序化和定期化，条件已较为成熟。为此，建议加紧建立全国性的调查网络，以便为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定期提供社会心理和社会分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的调查分析’包括对一些偶发突发事件进行快速反应式的调查研究。